

陈永志 校释

《女神》 校释

我是个无产阶级者
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
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
《女神》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
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
但是，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
所以我把她公开了

而且不仅是一本完善的《女神》汇校本，
是一本比较详备的《女神》注释本

《女神》哟！

你去，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；

你去，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。 [相等] (首)：相同

你去，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，

把他们的心弦拨动，

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！

[点燃] (首)：点燃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我是个无产阶级者
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
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
《女神》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
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
但是，我情愿成个共产主义者
所以我把她公开了

郭沫若著 陈永志 校释

《女神》 校释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女神》校释/陈永志校释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 - 7 - 5617 - 6120 - 5

I. 女... II. 陈... III. 诗歌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现代 IV. 1207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0742 号

《女神》校释

校 释 陈永志
责任编辑 王铁仙
装帧设计 黄惠敏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话总机 021 - 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 - 62865537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 - 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上海崇明县裕安印刷厂
开 本 787 × 1092 16 开
印 张 19.5
字 数 312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
印 数 5100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17 - 6120 - 5/I · 443
定 价 38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- 62865537 联系)

前言

一、《女神》的校、注、考、释

《〈女神〉校释》，顾名思义，即校《女神》之文，释《女神》之义。为了准确释义，免不了对文本的某些内容或加注文，或作考证，所以虽名“校释”，实际包括校、注、考、释。这是我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来解读《女神》的尝试。

校勘，首先要确定纳入校勘范围的版本与相关资料。这方面，国内学术界已做过的工作、取得的成绩、存在的问题，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这工作，将在下面《〈女神〉校勘的版本及相关资料》作详细的叙述。

进行校勘，就要选择底本。有资格充当底本的只有三种：《女神》初版本；《女神》1953年本；《女神》1957年本。《女神》1957年本是作者最后改订的，以它为底本自然有不少方便之处，但我还是选择《女神》初版本为底本，其原因是：第一，可以让读者看到这平时难得一见的版本，较具文献价值；第二，人们可据以逼近实际了解《女神》、也了解五四新诗的真实面貌；第三，以它为底本，顺序列出以后各版本及相关资料中作者的修改，可以方便读者、研究者对其作历史的批评。虽然《女神》初版本中，某些文字、标点的运用与现行的规范不同，但其数量不多，经技术性处理后（见《凡例》），即使青年读者阅读也绝无妨碍。

在校勘过程中，虽有已往的成果可资参照，但我还是据《女神》的三种版本及五种相关资料（见《〈女神〉校勘的版本及相关资料》）逐一校勘，不仅“谨小慎微”，逐字逐句、不放过一个标点，而且一再核对，生怕有所疏漏、失误。尤其对于首次刊登的文本，由于一般读者很难见到、即使专业工作者也非唾手可得，我更是反复再三，未敢稍有懈怠，力求不出现疏失。跟以往的校勘相比，它做到的我都做到了，它没有纳入的三种资料我已经补入，它的一些疏误我也予以补正，但我仍不敢说已做得完美无缺。不过，我相信，即使有缺，也极少，极小。呈献给读者的会是一本比较完善的《女神》汇校本。

与校勘相比，注《女神》的成绩实在相形见绌。《女神》的作品首次在《学灯》上刊载时，某些篇章已有了注，这些注，在1921年8月泰东书局出版的《女神》中保留了，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女神》，作者补充了一些注文，1957年人民文

学出版社出版了《沫若文集》第一卷,《女神》收入该卷,作者对注文作了修订,这是作者的最后修订。1982年《郭沫若全集》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,编者对其中的文学编第一卷所收之《女神》除吸收作者原注之外,增补颇多注文。即使如此,《女神》的注仍然十分单薄。

是《女神》没有什么可以注的吗?

郭沫若在青少年时期,已有了我国历史文化的丰富知识。他读过的中国古代书籍,我们如果仅就他在自传、创作与留日初期家书中提及的作个统计,就可以开列出一张长长的书目,这里面涉及经、史、子、集以及小说、戏曲。留学日本之后,于学习现代医学同时,他所涉猎之外国文学及哲学,不仅范围广泛,而且对某些作家及哲学思想颇为熟悉。可以说,《女神》时期的郭沫若已经学贯中外、博古通今。创作《女神》,又是在生命体验强烈,灵感突然来袭的状态中,读其中最优秀的作品,我们常感到激情如飞流直下,如海涛奔腾。这样,贮积于胸的万卷诗书,就融化在他的激情里,流泻在他的诗篇中。因而,《女神》之中,凡中外的神话传说、历史事实、地理胜景、著名人物、文艺名著,以及哲学与科学中的学说思想、名词术语,……无不纷然呈现,使人目不暇接,要对之一一说明,颇为繁难,何况,其中还融合着自身经历、隐密感情,要对之逐项探究,也非易事。这些,显示出《女神》注解的现状与之极不相称,也显示出注《女神》的繁难、必要与重要!

我在充分吸收已有注文的基础上,尽自己所知所能予以补注。有个别该注、因力所不逮而未注的,我也明白交代,以求方家指教。凡我思虑所及,该注的我都不使遗漏。我相信,这是读者、尤其是青年读者所需要的(《女神》已列入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推荐书目)。

《女神》中有不少作品的写作日期作者的说法不一,又有些作品一直未标明写作日期。这些作品中,有少数引起几位研究者的重视,但他们的考证也或是或非,更或在作者的诸种说法中作不同采择;而多数至今仍未被注意。这些作品的写作日期都需要重新加以考订。此外,《女神》中作品涉及的某些人、事,也有考索之必要。

《女神》的作品自1919年9月11日首次刊登,即受到国内外的注意,且好评渐多;1921年8月结集问世至今,更是评论不断,它不仅是郭沫若文学创作中最受重视的作品,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。就我读到的1921—2005年国内报刊上发表的专评《女神》的二百多篇文章而言,《女神》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比较丰富的,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。在这些不足中有两点比较突出,也是本

书拟作弥补的。其一,即上文说到的校不够完备,注过于单薄,以及对作品写作日期缺乏考订,这些可以说是不重视传统的研究方法;其二,就是在谈《女神》的基本精神时,众说纷纭,而又不够全面、准确。

《女神》的基本精神,研究者较多强调爱国主义,此外,或认为是个性解放,或主张反抗、自由、创造,更有以民主、科学、社会主义因素来概括。这些见解,或内容多有相通、重合,或各偏一面,或过于宽泛,都难以确切阐明《女神》的思想及其意义。二十年前,我开始重视《女神》所表现的积极人生哲学及其持久意义,并多次加以阐述。2004年,在将《女神》与《浮士德》的比较研究中,我认识到,《浮士德》努力描绘人的成长,尤其是精神的发展,以展现其普遍性的规律,而《女神》是立足于五四时代,歌唱那站在时代前列的新人的成长与发展,两者都强烈闪耀着人的发展思想的光辉。此时,我意识到,如果用人的发展的思想来概括《女神》的基本精神,会比以往的诸种说法更全面、更准确、更能反映它的思想及其意义。

《女神》中那新人的形象,经历诀别旧我的痛苦,而不断更新,日臻完善,并以不断创造、不断劳动融进新中国与新世界的伟大事业。它所显示的人的发展与祖国、世界的发展相一致,以祖国、世界的发展为目标的思想,既是五四时代中国人民以及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、求国家富强与个性解放的历史要求的反映,也是超越这一具体历史要求而具有普遍意义、持久意义的思想,它表现出在那样的时代人应该怎样发展、应该发展成为怎样的人,这样的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崇高品格、民族意识、全人类的胸怀,因而具有更广泛、更深刻的意义。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人们,都必然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,《女神》所表现的正能够给他们以启迪。《女神》的普遍的、持久的意义正在这里!本书的释义就专注于此,相信现在的人们,尤其是青年们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,会从中获得教益。我相信,曾经拨动五四青年们心弦的《女神》,一定能拨动今天青年们的心弦。

由于注文、考证与释义中有不少在内容上很难截然分开,于是我将它们合在一起,统称“注释”,共用一个序号标记,文字也力求简明扼要。我希望摆在读者面前的,不仅是一本完善的《女神》汇校本,而且是一本比较详备的《女神》注释本。

注释的内容繁多,凡名物、典故、文字、义理、源流、艺术(仅择要涉及),乃至创作情况的引述,写作时间的考辨,皆纳入其中,谨依文本本身的顺序,视必要逐一注释,行文不拘长短,也不恪守注、释、笺、证等的规范而加分类。汇校文字罗列于底本需校文字的相应位置右边,以减去插于底本文字之间引起的视觉上的不便,也减去置于底本之后造成的翻检的劳烦,而收到一目了然、便于比较研究之功

效。——如此集校、注、考、释于研究一部新文学作品，似乎至今尚未见过，没有可供学习、借鉴的先例，拙作所做，虽经三思，还是因未尽符合固有的规范而不安。我只是企望它作为个案，能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，我期待着以校注考释等传统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完美的著作问世。

由于体例所限，注释文字不能过繁，于是，凡需多花笔墨的，则另行成文，如一些作品写作日期的考证，就已单独成文并作为本书的另一个部分；又如有关人的发展的思想，也只能日后撰文加以阐述，好在此前，我已发表了《论〈女神〉的人生哲学》（载《钱谷融先生教学著述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）、《泛神论·中心形象·人生哲学——〈女神〉与〈草叶集〉比较谈》（《郭沫若学刊》2003 年第二期）、《人的发展：〈浮士德〉与〈女神〉》（《郭沫若学刊》2005 年第一期）等文章，它们可与本书释义的文字彼此参照、相互补充，读者不妨留意。

本书以校来确定文本的真实面貌，以注深入文本细部，以考证指明作品中有关人、事及写作日期，这些都为求得对文本内容合乎实际的理解，为把握《女神》的本义打下基础。对文本意涵即人的发展思想的探讨，则是从一个方面解读《女神》的本义。可以说本书的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：对《女神》本义的切实把握。

这里说的“本义”，与现在逐渐被重视的文本细读有联系更有区别，文本细读是方法，固然有助于了解本义，但运用不当，或求之过深，或自我作古，也会背离本义。本义，不是方法，是结论，是指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意涵，它是客观的存在。歌德的这一段话有助于我们对“本义”的理解：

在观察自然时，一般地说，我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：“在这里是谁在说话？——是你所观察的对象，还是你自己？”我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观察我的前辈和同寅的。

——《维廉·麦斯特的漫游时代》，关惠文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，第 308 页。

这段话包含有两层意思：一层要求文学家在反映现实时，要具有客观性，要让现实来说话，不要以主观认识代替现实本身；另一层是认为文学家在批评作品时，要具有客观性，要让作品本身来说话，不要把主观的评价外加给作品。如果我的理解没错，那么这后一层意思说的正是要尊重作品固有的意涵，即尊重作品的本义。我想歌德绝不会反对对作品的主观鉴赏，不会反对对作品的各种角度的阐释，他

如此强调文学批评的客观态度，——像自然科学家在观察自然时那样的客观态度，目的在于强调掌握作品的本义。因为只有做到这一点，一切的欣赏与评价才不至于踏空。

我希望本书能有助于读者对于《女神》本义的切实把握。

二、《女神》校勘的版本及相关资料

《女神》的校勘，已有桑逢康的《〈女神〉汇校本》（下称《汇校本》）这一重要的成果，它于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在这之前，1978年第四期的《安徽师大学报》发表了杨芝明的《关于〈女神〉的初版和1928年版本》一文，列出了《凤凰涅槃》等十篇作品在两个版本中的若干异文。1979年孙玉石发表《读〈女神〉随笔——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小问题》（载《文学评论丛刊·二》），同年，王维桑在《破与立》第四期上发表《从〈女神〉中两首诗的修改谈〈女神〉的研究》，都具体说了《匪徒颂》与《巨炮之教训》在初版本与1928年出版的《沫若诗集》中文字的差异。在研读《女神》的过程中，我一直比较注意版本的变迁，注意郭沫若对作品的修改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了拙作《试论〈女神〉》，其最后一节《关于版本》简略记叙了我在《女神》的版本与异文方面所见到与所想到的，我提出了具有异文的五种《女神》的“版本”，即《女神》的初版本、1928年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之《沫若诗集》、1944年明天出版社出版之《凤凰》、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《女神》、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《沫若文集》第一卷所收之《女神》。在这之前，我还写成了《〈女神〉异文汇录》，汇集了上述“版本”中郭沫若对《女神》作品的某些重要增删文字，此文几经周折，间隔了十多年，才在《齐鲁学刊》的增刊《沫若研究》第二辑发表，那已经是1983年了。现在看起来，杨芝明和王维桑的文章过于简略，后者关于版本的叙述还有错误，孙玉石的文章关注的重点并不在《女神》的版本和异文的本身。桑逢康和我的工作也都存在着一些问题。对这些问题的分析，是我们重新校勘《女神》首先该做的。

我的工作的明显缺点，是没有分清三个概念：“《女神》版本”、“具有异文的《女神》版本”、“具有异文的《女神》作品”。第一个概念是指《女神》的所有版本；第二个概念是指具有异文、因而具有校勘价值的、独立存在的《女神》版本；第三个概念则是指那些不以《女神》独立形式出现，而分散存在于郭沫若的诗歌集、诗文中又具有异文、具有校勘价值的《女神》中的作品，这些也可称为《女神》的校勘资料。

这三个概念是不能混淆,尤其是第三个概念所包含的种类颇多,都是《女神》校勘不可或缺的,版本的校勘本应包括具有异文的相关资料。由于没有分清上述三个概念,《关于版本》、《〈女神〉异文汇录》存在着一些缺点。其一,“关于版本”这样的标题自然让人们理解为第一个概念,即对《女神》所有版本的介绍,但其内容并非如此;其二,错误的把《沫若诗集》、《凤凰》看成《女神》的版本。在这两个诗集中,《女神》的作品已与作者其他的诗作混合编辑,《女神》已不独立存在,它们已不成其为《女神》的版本了。其中的《女神》作品虽有异文、有校勘价值,但只能作为“具有异文的《女神》作品”,即具有校勘价值的相关资料。其三,未能突出“具有异文的《女神》作品”这个概念,从而没有将《女神》作品首次刊登的文本纳入校勘的范围。

上述的失误,我长期没有觉察,也未见学术界的朋友们指正,遗憾的是桑逢康的《汇校本》重复了这些失误。《汇校本》在其卷首《说明》的第二、第三条写道:

二、《女神》及有关的版本较多,作者的改动也较大,主要有以下几种:

(1)《女神》初版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,……

(2)《沫若诗集》,1928年6月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,……

(3)《沫若诗全集》,1928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。……所收《女神》部分,全部同《沫若诗集》。

(4)《凤凰》,1944年6月由重庆明天出版社初版。……

(5)1953年1月,《女神》经作者作了若干修订,并加上必要的注释后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。……

(6)《沫若文集》第一卷,1957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《女神》全部收入此卷。

(7)“文学小丛书”第一辑第六种《女神》,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全部同《沫若文集》第一卷《女神》。

(8)《沫若选集》第一卷,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《女神》部分,未收《棠棣之花》、《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》、《夜》。其余均同文集本。

(9)《郭沫若全集》第一卷。1982年11月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。《女神》收入此卷。全集本是以文集本为底本,编者加了较详尽的注释。

三、本书以《郭沫若全集》第一卷中所载之《女神》为底本，并用上列(1)——(8)各本进行校勘。

上列的《汇校本》据以“进行校勘”的九种集子中，将已不成其为《女神》版本的第(2)、(4)两种当成《女神》版本。这是因为没有明确“具有异文的《女神》作品”这个概念，由于同样的原因，它也没有包括《女神》的首刊文本。这两方面，《汇校本》和拙作《关于版本》《〈女神〉异文汇录》的失误相同。此外，《汇校本》明明写着第(3)“全部同”第(2)，第(7)“全部同”第(6)，第(8)除未收作品外，“其余均同”第(6)，既如此，第(3)、(7)、(8)三种又怎能作为“进行校勘”的本子列入呢？至于第(9)种，除注释外，正文文字也全部同第(6)，同样不能作为进行校勘的版本。《汇校本》把没有异文、因而没有校勘价值的第(3)、(7)、(8)、(9)四种集子与具有校勘价值的集子同列，并说用以“进行校勘”，是令人费解的。《汇校本》所列九种集子中，只有第(1)、(2)、(4)、(5)、(6)五种具有校勘价值，这与拙作《关于版本》所说相同；而它将没有校勘价值的本子列入，反而从拙作后退了。

既然以前的校勘工作存在着缺陷，在重新校勘以前，就有必要再度审视《女神》的版本及相关资料，以确凿地肯定具有异文，因而具有校勘价值的《女神》版本及相关资料，并对这些版本及资料作具体介绍。——这些介绍是必要的，因为其内容无法在校勘文字中反映出来，但又是校勘不可或缺的。

郭沫若在好些文章里叙述自己创作《女神》的经过，从中我们知道，个人的郁积、民族的郁积，当时新诗创作现状的激发，五四爱国运动的鼓舞，《草叶集》的自由体与豪放诗风的启迪与煽动，他本已逐渐成熟的写诗才能终于显露，并得到那时任《学灯》编辑的宗白华的赏识与鼓励，于是他开始登上五四新诗坛，并显示非凡的姿态。他的新诗频频出现在《学灯》上。这些诗后来多半收入《女神》。收入《女神》的还有少数发表在其他刊物，及附于他书信之中的。这些作品的文字与《女神》初版本的相比，有很多不同，甚至有重大差异。这些作品因未编集，当然不能冠上版本的名目，但它们是《女神》校勘重要的有价值的资料。为简便起见，我们将这些作品称之为“首刊作品”，简称“首刊”。

这些作品在《学灯》上发表时，极少用“郭沫若”全名，个别用“沫”，绝大多数用“沫若”。但它到底是“mèi ruò(沫若)”，还是“mò ruò(沫若)”？郭沫若的本意是前者，为何竟以后者行世？我查阅了发表在《学灯》、后收入《女神》的全部诗作，发现上述两个笔名并存。如《新阳关三叠》、《无烟煤》同日刊出，前者作“沫若”(mèi

ruò),后者作“沫若”(mò ruò),发表于同日的《夜》与《死》也是如此。不过最早刊出的《鹭鸶》及大多数诗作都印成“沫若 mò ruò”,这大约是造成以“沫若”(mò ruò)之名行世的原因之一。

诗作发表后,国内文坛反响积极而强烈,郭沫若本来就有的弃医从文的倾向,因而进一步加强。1921年4月,郭沫若回国寻求在文艺方面的发展。到上海后,为泰东书局编译新书,并商量出版纯文艺杂志的事,就在这时候,郭沫若“开始编纂……诗集《女神》”(《创造十年》)所收作品起于1919年9月11日发表的《鹭鸶》,止于1921年5月2日发表的《司春的女神歌》。从《序诗》写于5月26日来看,大约《女神》就在5月编纂完成。可是出版却到了8月,相隔了三个月,与当时出版的常规相比,似乎过于拖延了。其中的原因,尚无确凿的材料据以说明。我个人推测,此时郭沫若、成仿吾等人已有心创办纯文艺杂志,并组织自己的文艺社团,很可能,郭沫若有意将《女神》的出版作为新成立的同人团体的一份业绩,因而延宕了出版时间。果然,当创造社成立之后,八月里,《女神》便以“创造社丛书”第一种的名义问世了。通常人们把这个版本称“《女神》初版本”。

据初版本的版权页,《女神》是1921年8月5日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的。但郑伯奇在《批评郭沫若君的处女诗集〈女神〉》一文的开头写道:“郭沫若君的处女诗集《女神》已于昨天出版了。”这篇文章连载于8月21—23日的《学灯》上,而写于8月16日,这“16日”的“昨天”当然是“15日”。能否这样说,8月5日是《女神》付印的时间,8月15日,才是这部中国新诗的经典作品真正问世的时间。

初版本封面上“女神”的大字标题之下,有一行括弧小字“剧曲诗歌集”,这是对本书体裁的说明了。再下面,则用较大的字体明白无误的写着“郭沫(mèi)若著”四个大字,奇怪的是,人们总还是读成“郭沫(mò)若”,联系《学灯》上《女神》诗作署名的情况,该可以推定当时人们对“沫(mèi)”字很生疏,而对“沫(mò)”较熟悉,以至排印者、读者不管是“沫 mèi”是“沫 mò”全都认为、读成“沫 mò”,而本人当时又从没有声明更正,所以郭沫(mèi)若也就永远的成为“郭沫(mò)若”了!

翻开封面,我们首先看到的不是目录,而是《序诗》。《序诗》之后才是目录。当然,《序诗》之标题也列于目录之中。

《序诗》之后,正文共分三辑。第一辑含三个诗剧;第二辑含三组诗,每组有标题,依次为《凤凰涅槃之什》、《泛神论之什》、《太阳礼赞之什》。每一组诗中各有十篇诗,全辑共三十篇诗。第三辑也含三组诗,共二十三篇,每组也有标题。每组内的诗篇数目各不相同。《爱神之什》有十篇,《春蚕之什》有八篇,《归国吟》则只有

五篇。这样,《女神》初版本共有五十七篇作品。要申明:上述是以“篇”计数,有的
一篇内含若干首,则不另计入。

《女神》将诗分组,均冠以“什”之名,这是有来由的。他年轻时即爱读袁枚的
《随园诗话》,该书卷六第四则对此就有说明:

今诗称“篇什”者,本左传所谓“以什其车,必克”之义。“什”者,十人
为耦也。国风诗少,可以同卷;雅,颂篇多,故每十为卷,而即以卷首之篇
为什。

“篇什”之称,原于《左传》,以“卷首之篇为什”始于雅、颂。郭沫若有意仿效,
每组诗也以“卷首之篇为什”。数目都是十篇,其中《春蚕之什》,因《岸上》一篇有
三首,故也称“什”。至于《归国吟》一组,并无“什”之称,但因为《西湖纪游》有六
首,全组也暗含“什”之数。

《女神》初版本较之“首刊”,有不少变动。分散的作品按辑、辑中分组有序的
编定了,诗的标题、内容、结构,都有更改,文字之修改就更多了,诗集《女神》的面
貌于此定型。它当然成为《女神》校勘最重要的版本。

初版本之后,泰东书局反复据此再版,据萧斌如、邵华等编写的《郭沫若著译
书目》所载,共有 1922、1923、1927、1928、1929、1930、1935 年等多种版本,其中
1930、1935 年两种版本,我没有见到,我另见到过一种 1932 年的版本。就我所见
过的而言,这些版本其实都是初版本的重印本,编排、文字均与初版本相同。就校
勘的角度看,这些重印本是不必考虑在内的。

大革命失败后,郭沫若被蒋介石通缉,于逃亡日本之前,蛰居上海。在大病后
的康复期间,除继续从事创作与翻译之外,还编定《沫若诗集》。他当时的日记《离
沪之前》于正月三十一日这一天记着:“校读《女神》”,这“校读”当然包含着修改
在内。

《沫若诗集》作为“创造社丛书”第二十一一种,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。1928
年 4 月 1 日付排,1928 年 6 月 10 日初版。印数三千册。诗集共分七辑,以罗马数
字标出序号,每辑均有标题,依次为:《女神三部曲》、《凤凰涅槃》、《天狗》、《偶像崇
拜》、《星空》、《春蚕》、《彷徨》。其中第六、七两辑又各分四组,各组均以英文字母
标出序号,而且也都各有标题。第六辑四组标题依次为:《爱神之什》、《春蚕之什》
(在《沫若诗集》的目录中,漏排“之什”)《Sphinx 之什》、《广寒宫》;第七辑四组的标

题依次为：《归国吟》、《彷徨之什》、《Paolo 之什》、《泪浪之什》。所有作品都以阿拉伯数字标出序号，可以清楚计算出，诗集七辑共收九十七篇作品，含诗剧三篇，童话剧一篇，诗歌九十三篇（其中有一篇包含若干首，不另计入）。

就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，《沫若诗集》由《女神》与《星空》的大部分作品，以及1920—1923年部分未编辑的诗作合编而成，其中所收《女神》的作品的编辑也与《女神》初版本不同，《女神》已不单独存在了。《沫若诗集》虽不能算是《女神》的版本，但因作者对编入其中的《女神》作品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，成了“首刊”文本之外《女神》校勘的另一重要资料。为行文的方便，我们把这本子简称为“1928年版《诗集》”。它所收的《女神》作品与《女神》初版本比较，有如下不同点：（1）对诗作重新组合、分辑，每辑的标题亦有改动。（2）删去《序诗》、《无烟煤》、《三个泛神论者》、《太阳礼赞》、《沙上的脚印》、《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》等六篇诗。此外，《别离》之白话译诗也未收入。（3）所收作品修改之处颇多，且有牵涉内容、结构重大变化的修改。（4）给不少作品加注了写作时间。

以后，《沫若诗集》曾由现代书局、复兴书局多次再版，我见过的有现代书局1932年版，复兴书局1946年版。其中有的还增加了诗集《瓶》。此外，还有增加了《瓶》、《前茅》、《恢复》的《沫若诗全集》行世，我见过的有现代书局1930年版。（关于《沫若诗集》及《沫若诗全集》的版本，肖斌如、邵华等人编辑的《郭沫若著译分类书目》、《郭沫若著译书目》有具体的介绍，本文不赘）。现代书局或复兴书局出版的《沫若诗集》、《沫若诗全集》的诸多版本中，所收之《女神》部分，无论编排与文字都与“1928年版《诗集》”相同，当然都没有必要将其纳入校勘范围。

抗战时期，郭沫若的诗集《凤凰》由重庆明天出版社于1944年6月印行。印数四千册。郭沫若为这部诗集特地写了篇《序》，（后改题为《序我的诗》，编入《沸羹集》）。这篇《序》里，有些耐人寻味的话。他说他不高兴别人称他为诗人，但为什么又要编诗集“来骗人呢”？那“一半不关我的事，一半也因为要使内行的人知道我究竟不是‘诗人’”。说别人要他将自己的诗编集出版，当然是真话，至于他同意编集出版是要让人知道自己“不是诗人”，却说得有点儿曲折了。

郭沫若真的认为自己的诗不好吗？至少《女神》他是满意的，他说产生《女神》时那种“在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味的”。至于《女神》以后的某些诗，他也有割舍不了的情意，“要从技巧的立场来说吧，或许《女神》以后的东西要高明一些”。从序文所说来看，这技巧比《女神》高明一些的，指的是《星空》与《瓶》。《凤凰》就据《女神》、《星空》、《瓶》编辑而成。郭沫若终究还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是一个怎样

的诗人!

《凤凰》分七辑,《女神》也不独立存在。它的编排大体依据“1928年版《诗集》”,另有几处不同:

(1) 删去一些作品,其中属于《女神》的有:《女神之再生》、《湘累》、《棠棣之花》三部诗剧;《巨炮之教训》、《匪徒颂》、《上海印象》三篇诗。这样,《凤凰》所收之《女神》作品,除《沫若诗集》所删去的六篇及《别离》之白话译诗仍未收入,再删去六篇,它所收之《女神》作品就仅只四十五篇了。

(2) 在删去《沫若诗集》由三个诗剧所组成的第一辑后。其余六辑的排序依次晋前,另增加《瓶》为第七辑。

(3) 《凤凰涅槃》作为第一辑,或者为和以后各辑的体例相一致,列出细目:①序曲,②凤歌,③凰歌,④群鸟歌,⑤凤凰和鸣。

(4) 对所收之《女神》作品的文字,作者又作了不少改动,且仍有牵涉到内容的重大改动。这一点,使它也成为《女神》校勘不可或缺的资料。也为行文方便,简称之为“1944年版《凤凰》”。

抗战胜利结束后,1947年3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再版了《凤凰》。它将“1944年版《凤凰》”所收作品,全部收入,而且编排一样、文字一样,甚至连印错的地方也一样:明天版《凤凰》中,《星空》的写作时间误印为“一九一二年”,《蜜桑索罗普之夜歌》的写作时间误印成“二九二〇年”,《偶成》一诗左下角莫名其妙多印出一个大大的“唐”字,群益版《凤凰》全都“照误”不变。尽管如此,群益版《凤凰》与明天版《凤凰》相比,仍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:(1)明天版《凤凰》的封面,于书名《凤凰》之下写有:“(沫若诗前集)”,而群益版《凤凰》则于扉页《凤凰》书名下写有“沫若前期诗集之一”;(2)明天版《凤凰》有目录,群益版《凤凰》则仅于扉页上写明:“前期诗集七种:①《凤凰涅槃》,②天狗,③偶像崇拜,④星空,⑤春蚕,⑥彷徨,⑦瓶”;(3)群益版《凤凰》于全书之后,附上明天版《凤凰》删去的五篇诗,其中属于《女神》的有三篇:《巨炮之教训》、《匪徒颂》、《上海印象》,而且其中的文字与诗节均有个别改动。考虑到这些不同,尤其是第(3),我们还是把它看成《女神》校勘的一种资料,称它为“1947年版《凤凰》”。

解放后,五四新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,“中国现代文学”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,新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不断再版。自20世纪50年代,先出版了不少作家的选集,继之还陆续出版了部分作家的文集,80年代以后,更有少数作家的全集问世。

郭沫若的文学创作,解放后首先出版的,是开明书店于1951年7月作为“新文学丛书”之一推出的《郭沫若选集》(上、下两册)。这是由作者自己编选的,书前还有作者的《自序》。在上册的《诗选》部分,有十篇诗选自《女神》:《凤凰涅槃—菲尼克司的科美体》、《炉中煤—眷念祖国的情绪》、《地球,我的母亲》、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、《夜步十里松原》、《蜜桑索罗普之夜歌》、《霁月》、《晴朝》、《晨兴》、《黄浦江口》。这十篇诗中,文字有几处改动,应纳入校勘的范围。我们简称为“1951年版《选集》”。

1953年4月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女神》的单行本,在扉页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于该年1月写的《本书出版说明》一则:

《女神》出版于1921年8月,是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。现在经作者作了若干修订,并加上必要的注释,重新出版。

既经作者亲自修订,它在《女神》的校勘中当然是不可忽略的,我们把它称做“《女神》1953年本”。

“《女神》1953年本”是《女神》在初版之后,经过长久与其他诗集合编而第一次独立。在编排上,基本恢复了初版的面貌,唯删去第二、第三辑内的分组及其标题,而诗作的顺序并无改变。以前编集时删去的作品都重新收入,另删去《夜》、《死》、《死的诱惑》三篇诗。最重要的,当然是《本书出版说明》中所说的“作者作了若干修订”,这“若干”,应该说成“不少”才比较准确:(1)将“1928年版《诗集》”、“1944年版《凤凰》”中所作的一些改动,部分恢复初版的原貌;(2)文字上又有新的修改。

1957年3月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沫若文集》第一卷,其中《女神》作为第一辑。在出版社编辑部写的《第一卷说明》中指出:

本卷收入《女神》、《星空》、《瓶》、《前茅》、《恢复》等诗集中的作品及其他集外诗作,分为六辑。

.....

以上各集中的诗作,曾由作者分编在《沫若诗集》(1928年)《凤凰》(1947年)及《郭沫若选集》(1951年)中。现在是根据初版本并经作者修订后编入的。

仅就《女神》而言，这个“说明”只提 1947 年群益版的《凤凰》而没有提 1944 年明天版的《凤凰》是不妥当的；说“根据初版本并经作者修订后编入”也不够妥善。《沫若文集》第一卷所收之《女神》，跟《女神》1953 年本一样，第二、三辑均不分组，当然也无各组之标题；被 1953 年本删去的三篇诗重新收入，这样所收作品完全恢复了初版本的数目。郭沫若对作品的再度修订，是在 1928 年版《诗集》、1944 年版《凤凰》、尤其是《女神》1953 年本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大多是字、词上的改动，使之更准确、生动，个别牵涉到结构的变化，使其更合理、完善。它在校勘上具有重要价值，我们称之为“《女神》1957 年本”。

需要申述的是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 1958 年 6 月出了《女神》的单行本，并注明是“《女神》1953 年本”的第二版。就版本说这是不错的，但从实质上看，他们是《女神》1957 年本的重印本，主要的证据就是：文字乃至个别注释凡“《女神》1957 年本”修订的，也即与“《女神》1953 年本”不同的，都按“《女神》1957 年本”排印；“《女神》1957 年本”重新收入“《女神》1953 年本”删却的三篇诗，其编排按照初版本，1958 年出版的《女神》也与此相同。1977 年 12 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女神》，仍然是“《女神》1957 年本”的重印，不过，在书前的《出版说明》中还是说“按 1953 年版重予印行”。

1982 年 10 月，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定的《郭沫若全集·文学编·第一卷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诗集《女神》收于此卷。编者所作的《第一卷说明》写道：

《女神》是作者第一部诗集。初版于 1921 年 8 月，……后经作者数次修订，现在根据 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沫若文集》第一卷版本编入。

既然如此，《郭沫若全集》所收之《女神》，与《女神》1957 年本完全相同，它就没有校勘的价值了。

《郭沫若全集·文学编·第一卷》所收之《女神》，编者“加注”和“附录”了一些初版的文字，又在作者原注的基础上添加了不少注文，此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女神》单行本，就都依据它重印了，例如，1998 年出版的作为“新文学碑林”之一的《女神》，以及 2006 年出版的作为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之一的《女神》。可在版权页上，前者写着“1953 年 4 月北京第一版，1958 年 6 月北京第二版，1998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”，后者写着“195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，1977 年 12 月北京第

2版,2006年6月第1次印刷。”

可以这么说,1957年3月《沫若文集·第一卷》出版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《女神》单行本,均据它所收之《女神》重印。这种情况至1982年10月《郭沫若全集·文学编·第一卷》出版为止,这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《女神》单行本,又都据《郭沫若全集》所收之《女神》重印了。尽管这些重印本的版权页上全部同样写着据《女神》1953年版重印。——这一点,宜请读者注意。

在《女神》校勘中,有些特殊的情况,有必要加以交代。

《胜利的死》首刊于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后,不久又刊于《少年中国》二卷六期(1920年12月15日出版),后者的文字与首刊的相比较,有三处语助词变动,但与《女神》初版本所收的却完全相同。我们的校勘以初版本为底本,因此《少年中国》刊出的文本在校勘中就不另提出了。《登临——独游太宰府》一诗虽初见于1920年2月15日郭沫若致田汉的书信中,但此信载于1920年5月出版之《三叶集》,其问世反倒比它单独发表(载1920年3月6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)晚得多,而且其文字与《学灯》上发表的完全相同。这样,我们就将《学灯》上发表的作为首刊,并纳入校勘范围。

《女神之再生》、《湘累》、《棠棣之花》这三个诗剧,又见于光华书局1930年出版的《女神及叛逆的女性》以及《沫若小说戏曲集》,都是据1928年版《诗集》的文本编入的。此外,《湘累》还单独收入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出版的《沫若自选集》,仍是按1928年版《诗集》的文本收入。其中虽有一处差异,但仅少一个助词“的”,恐怕是重排时遗漏了。这些当然是校勘所不必考虑的。

其中,最繁杂的是《棠棣之花》。作者对它的修改,前后历经二十年,经历了从独幕诗剧到多幕历史剧的变化。下面,我们据《棠棣之花》之《附白》(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1920年双十节增刊)、《棠棣之花》第二幕之剧前说明(《创造季刊》1卷1期)以及郭沫若1941年写成的《我怎样写〈棠棣之花〉》,对这个变化过程加以叙述,以确定我们校勘的范围。

1920年春,作者拟作十幕剧,且已将前五幕大体写好,但后来觉得构思存在着“时间不统一”,“人物不统一”的毛病,在1920年暑假,将计划改为三幕五场,即原已写好的五幕中之第二幕、第三幕分别成了三幕剧中的第一幕第二场以及第二幕。作者并先后将它们发表,前者以《棠棣之花》为题发表在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1920年的双十节增刊上,并收入《女神》初版本,即我们校勘的底本;后者以《棠棣之花》第二幕为题发表在《创造季刊》一卷一期上。余稿则全部废弃。1925年,郭